

史志传声

市委党史研究室组织“七一”党课学习

6月30日上午，市委党史研究室召开全体干部会议，举行“七一”主题党课。室主任姚晓东作专题辅导。
“七一”主题党课以《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为依据，从五个方面对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的重要论述作了系统辅导，深刻认识学习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现实意义，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历史，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确评价党的领袖人物，构建中共党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
“七一”主题党课指出，历史研究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坚持“党史姓党”“一突出、两跟进”。要讲好党史故事，讲好宁波党史故事，推动党史知识的普及，充分发挥党史教育的作用。
(毛利丹)

市委党史研究室传达学习省第十四次党代会精神

6月27日下午，市委党史研究室召开全体干部职工会议，传达学习浙江省第十四次党代会精神。
会议指出，省第十四次党代会是浙江高水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入决战决胜阶段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全面贯彻落实了“八八战略”，确立了“两个高水平”的宏伟目标，提出了“六个浙江”建设的基本要求、“四个强省”的工作导向、七个方面主要任务及全面从严治党等具体要求，对浙江改革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会议要求，全体同志要深刻领会领会把握党代会精神，认真贯彻落实站要高、格局要大、理念要新、举措要准、作风要实的要求，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党代会精神上来，以实际行动为建设“名城名都”助力。
(毛利丹)

纪念浙东抗日根据地创建75周年——金融货币串起的红色记忆

王佳 胡国忠 陈质彬 李维超

历史不会忘记。1941年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作出开辟浙东战略基地的重要决策。

在中共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的领导下，由浦东南渡的抗日武装，浙东地方党组织和游击队，以及从华中局、新四军军部和第六师、第一师派出的一大批干部，先后汇聚浙东，开启了共同创建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征程。

浙东抗日根据地地处祖国东南海滨、杭州湾两岸、沪杭甬三角之间，以余姚梁弄为中心，东濒东海，南迄甬金公路，西跨浙赣路金萧线两侧，北达黄浦江两岸，包括三北、四明、金萧、淞沪、三东的广大地区，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从1941年初至1945年9月，在长达四年多的敌后抗战中，浙东区委领导浙东军民，与日伪顽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转战643次，歼灭日伪军9197人，为祖国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20世纪80年代，中央党史研究室到宁波考察调研，评价浙东抗日根据地“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个‘全’字，包括根据地创建中开展的财政金融工作。”市委党史研究室的研究人员介绍，这项工作，随着根据地的军事、政治斗争发展而发展起来，为军事、政治斗争服务，经过了初创、发展、巩固等几个阶段。“每个阶段采取的方针政策，至今看来，依然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浙东抗日根据地孤悬敌后，充满艰险，创立之初，便饱受敌伪控制货币命脉、进行经济渗透与打击之苦。在这一时期，根据地的财经金融事业开始“筑基”，建立了“三北游击司令部经济委员会”，下设慈溪、游山、余姚分会，分会下面是税务所；组织了一支财经税收的队伍，成为财经税收工作的骨干；采取不同形式抓收入，收税、搞钱粮、收爱国捐款。在比较艰苦的生活条件下，保证了部队的基本需求。

当根据地建设进入发展阶段，财经金融工作有了“质”的飞跃。在浙东区委领导下，财经工作“多管齐下”。

巩固和加强税收金融工作。1943年后改设税务分局，下设税务派出所，派出所下设税务卡，采取武装护税办法。为健全税务制度，草拟了《战时进出口货物物征收暂行办法》，并采取了物资分类征税的政策，规定了四大类的税率。利用税收政策的经济杠杆来冲破敌伪的经济封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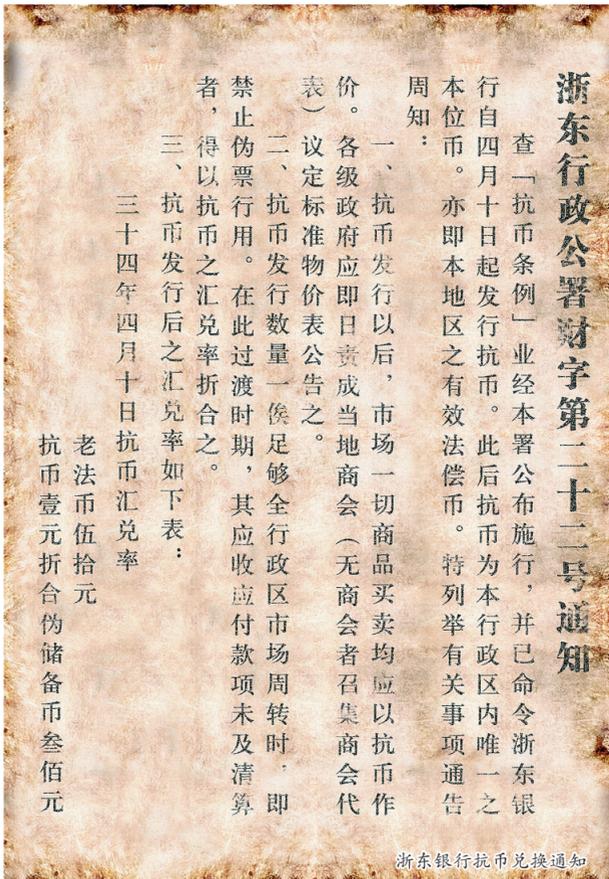
完善征粮办法。征粮是根据地主要的收入来源，征粮地区分为游击区、基本区、敌顽区。前两种地区收公粮，敌顽区采取收缴公粮款、解缴法币的办法。1944年征粮法正式公布，规范了征粮工作，将公粮和田赋合并征收，一年一度，一次征收。

着手准备发展金融事业。设法制造抗币铜板；组织力量做好抗币的印制工作；做好统筹发行工作；起草抗币条例和银行条例，以及起草关于发行抗币向华中局的请示报告等。

当时间进入1945年，随着根据地的扩大和巩固，根据地金融事业也进入了巩固健全阶段。

这一年，根据浙东敌后各界临时代表大会决议，报经华中局同意，1945年4月1日，浙东银行成立。发行抗币总数为200万元，等于粮食200万斤的价值，作为浙东银行的准备金，同时公布《浙东行政区抗币条例》和《浙东银行条例》。浙东银行抗币成为浙东地区唯一的地方本位货币，其后盾以稻谷为主，还有金银、有价证券、固定资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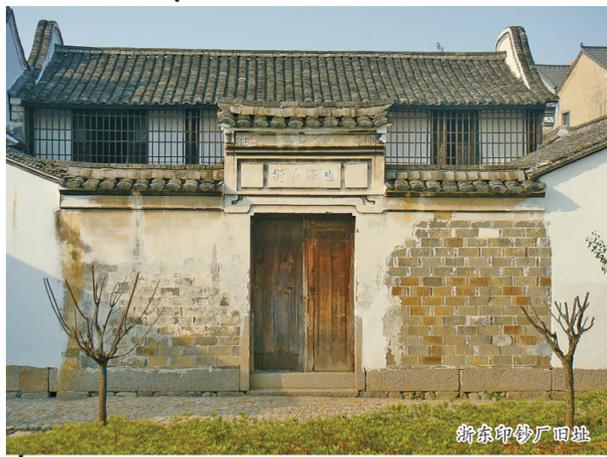
“健全金融制度，稳定物价，方能进一步发展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这在当时已成为一种共识。”据相关史料记载，当时，整个浙东抗日根据地的财政收入，除了维持本地区的一切开支外，还有节余上缴。



浙东银行抗币兑换通知



浙东抗币印刷机



浙东印钞厂旧址



目前，浙东抗日根据地金融货币展正在位于郁家巷1号的宁波金融史馆展出。此次公益展的展出时间为2017年10月7日（上午9:00—11:30，下午1:00—4:00，周一闭馆）。前往参观的中小學生可凭学生证免费领取一套记载这段历史的书签。

本文图片由钱币学会、市金融史馆、鄞州区家庭档案联谊会会员郁松林提供

东游击司令部作出决定，设立金库，建立总金库制。

按金库制度规定，所有现金，包括税款、粮食代金等都应解入金库，各地所需费用，都由金库下拨；军政机关的开支费用，必须有预决算制度。为了贯彻执行这个制度，由浙东敌后临时行政委员会和浙东行政公署发行金库兑换券。

“在当时敌我交错、战斗频繁的环境下，解送大量现金、长途往返于敌我之间是十分危险的，金库兑换券便发挥了积极作用。”党史研究人员说，该券印发各单位、各部队后，可凭券向当地税务机关、县财经科提取现金；再由各税务机关、县财经科将金库兑换券汇集，抵作现金缴入金库。“按期有预算决算，各级负责人亦不得乱批条子，规定执行严格，风气很好。”

金库兑换券是浙东根据地认真学习其他根据地的货币发行经验，结合浙东地区斗争实际，创制出的一种独特“抗币”，起初仅限于内部划拨支付，随后，由于被社会所信用，乃逐渐流通于市场。

在浙东根据地流通的货币中，除了纸制货币，另有金属制货币，据党史研究人员介绍，这种浙东抗币金属辅币极为罕见，为全国抗日根据地首创，也是独一无二的。

该币用钢模压制，镞质制作，于1945年8月19日至9月30日期间，由浙东行政区行政公署所属余姚县游山区抗日民主政府发行，在署所辖范围内通用。游山区镞质抗币有壹角、贰角、伍角三种面额，币正面上方“游山区临时辅币”字样；下方为年号“1945”；背面是光背。

这种金属辅币是浙东地方抗币的一种。地方抗币大多发行于1945年8月到9月间，与浙东银行抗币等价流通使用。“地方抗币，亦是浙东区委领导下的军政单位坚持敌后抗日、对敌开展经济斗争的一种特有金融手段。”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根据地的迅速扩大，抗币供应未能满足需求；因敌伪统治面临崩溃，法币和伪币的恶性通货膨胀，交易急需大量抗币去占领市场。浙东银行的抗币因受材料、设备、技术和运输条件的限制，发行数量跟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

浙东行政公署一方面命令浙东银行加紧印发主币和辅币，增发本票，将金库兑换券加盖印章后对外流通，组织各支行印制发行兑换券。另一方面采取应急措施，允许各级地方政府及合作社、盐行、商会等经济团体印发兑换券和辅币，借此以弥补抗币

发行的不足，活跃金融市场。

抗币在群众中的威信很高，“因为信用很好，币值稳定。”在抗币发行前，浙东根据地的党政军领导、相关负责人便研读华中局的指示，实施中创新性地把握几大原则，科学确定抗币和法币的比价，贷款给群众时采取生产发行的方针，同时开展贸易管理等，大力巩固了抗币的信用。

诚信，永不过时的价值取向。

抗战胜利后，为了全国的和平大局，1945年9月20日，中共中央电令浙东部队及地方党政立即北撤。

为维护党和根据地政府的威望，保障百姓经济利益，维护抗币的价值，浙东根据地开展了抗币的回收兑换工作。

根据地政府组织人员发布兑换通告，设立兑换处，拨出粮食、白布、食盐等实物兑换，也有用法币甚至黄金、银圆进行兑换。其中，粮食以一元抗币折合一斤大米的比价回收。回收后，抗币就地销毁。其中，浙东银行共收回本行发行的抗币647658.55元。

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永不褪色的价值。小小抗币，见证了浙东抗日根据地创建的历史性壮举，更凝结了这份难得的红色精神。

“大批的公粮征收起来后，分散给老百姓储存，保管得也很好。”浙东行政公署财经处处长、浙东银行常务董事陆慕云的回忆文章里这样写道。

凝聚群众的首创精神，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是共产党永远的制胜法宝。当时，敌伪以据点为依托，对浙东根据地实行严密封锁，严禁军需物资和民用必需品进入根据地。根据地军民携手，在税收政策这个杠杆的带动下，布匹、药品等一部分军需物资，必需的日用品，甚至一些枪支弹药，被“巧妙”地送入根据地。

为抵制伪币，稳定地方物价，方便市场交易，浙东地区于1940年后便出现民间商会。商会是商人自发组建的群众性团体，这支民间力量在1945年为应对货币危机、保护地方利益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浙东根据地的党政军民在4年多时间里，在自己的解放区内，逐步建立起人民的金融事业，这份光辉业绩和展现出的红色精神，犹如一座丰碑，巍巍矗立，永不磨灭。

红色记忆

沙文求烈士故居

沙文求烈士故居，即沙氏故居，位于鄞州区塘溪镇沙村，是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宁波市中共党史教育基地。

沙文求（1904—1928），生于鄞县大成乡沙村（今属鄞州区塘溪镇）。1925年春，考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开始接受马列主义，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的五卅运动。同年秋，转入上海复旦大学物理系。同年冬，在宁波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初，受中共宁波地委指派回家乡沙村开展农民运动，成立了沙村农民协会，办起了农民业余学校，先后吸收了4位农民入党，建立了宁波地区最早的党支部之一——中共沙村支部，沙文求任书记。同年秋，赴广州中山大学哲学系学习，任该校共青团支部书记。1927年11月11日，广州爆发了党领导的武装起义，沙文求任共青团广州市委委员兼少先总队队长，后又任赤卫队队长。广州起义失败后，他先后在香港、广州坚持与敌人斗争，后任中共广州市委秘书长。1928年8月不幸在广州被捕，牺牲于广州红花岗。

沙文求烈士故居建于清末。1984年，鄞县人民政府拨款进行维修。故居大门上有烈士兄长沙孟海亲书“沙文求烈士故居”石刻碑额。故居中堂右侧两间房设为陈列室，用25块版面，分3大部分介绍沙文求伟大、光辉的一生。2004年，烈士诞辰百年纪念时又增补部分展品，包括他少年求学、工作时的作文簿、笔记本，有他在山上海上开会时取暖用过的铜火罐，也有他给兄弟以鼓励并自勉的书信、图画。

(张伟杰)

